

persist

帝国 突围

摇晃中
的
光绪二十四年

余音 著

rigorous

《百家讲坛》主讲 王立群 推荐 **纠史之偏，补史之阙**

倾注作者十年心血之作 讲述不忍细看的历史

是帝国的主角 见证那一年的铁血突围

远方出版社



光绪帝立志不做亡国之君，孙家鼐老耄之年建学堂，李端棻妙笔绘蓝图，陈宝箴怒批康有为……拒绝历史描写脸谱化和简单化，走进真实、残酷、热血的光绪二十四年。

persist

帝国 突围

摇晃中

的

光绪二十四年

余音著

rigorou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余音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

ISBN 978-7-5476-1422-8

I. ①帝… II. ①余… III. ①戊戌变法—史料

IV. ①K2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2367 号

策 划 曹 建

责任编辑 唐 鋈 曹 建

封面设计 张晶灵

帝国突围

——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

余 音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76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422-8/K·175

定 价 56.00 元

我的“实说”历史主张

人类凶猛不如虎豹、灵巧不如雄鹰、奔跑不如羚羊、耐力不如骆驼，为何能成为地球之王？一言以蔽之，人类懂得历史，也就是懂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史为鉴、吃一堑长一智，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通过总结—提高—再总结—再提高，循环往复，最终优胜劣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古老，最重要，也最有生命力的一门学问，文史著述永远都不会缺乏读者。

不同的“理论”导致不同的结果

关于研究历史的理论，多如牛毛。纵观过去研究历史的方法，解读、传承历史知识的模式，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戏说”，就是把历史演义化、庸俗化、戏剧化，只要能够吸引眼球、赚取“银子”，就可以肆意篡改、曲解，甚至是编造“历史”。

其二，“自说”，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知，打着“一家之言”的旗号，把历史当作面团，随意解读，难免坠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其三，“纸说”，就是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纯理性推演，形成一定的观点，得出“结论”。表面上，这些“结论”看似言之有据，实质上却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

“实说”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

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

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

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四种历史理论优劣之比较

“戏说”，实际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从文学或娱乐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把“戏说”引入史学研究、传播领域，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史学研究的前提之一，就是注重客观性——公理。“自说”者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由于其主观色彩浓厚，很容易偏离客观事实而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比如，纪连海口若悬河，言之有“据”，将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婚外情”，不仅是纯属虚构的无稽之谈，还是对华夏先祖的糟蹋和亵渎。博导、教授于丹不管《论语》的原意，在《于丹〈论语〉心得》中公开打出“一家之言”的旗号，任意解读《论语》，甚至望文生义，将“小人”曲解为“小孩子”，露出了自己学风不正、学识不精的“马大脚”。而轰动一时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充满了浓厚的“自说”色彩。

“纸说”是一般历史学者通用的研究方法，其危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为了说明“纸说”与“实说”的本质区别，特举一例如下：

《康有为政论集》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①等《戊戌奏稿》全部作为真件收入。孔祥吉研究后指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于宣统三年(1911年)才出书,其距离百日维新已达十三年之久。事过境迁,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戊戌奏稿》所辑奏疏之内容多有改易,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②不少奏稿并未送达朝廷,所以,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发生实际作用。一些研究者不辨真伪,以《戊戌奏稿》为基本依据来研究戊戌变法,闭门造车地撰写《戊戌变法史》等鸿篇著述,将高楼大厦建筑在谎言的沙滩上,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难免会大打折扣。

再比如,宋德华对《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进行了深入考证,指出“原折仅请改元易服”,“《断发折》并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后重拟。”^③即使是就1898年9月5日康有为上的《请易服改元折》而言,一般论者认为易服是“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而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就会发现,康有为此举实际上是脱离当时国情的激进主张,对戊戌变法起到的是损害作用。康有为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遭到朝野反对,就连老百姓都不赞成。同情维新的封疆大吏刘坤一明确批评说:“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变更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④“易服”受阻,原因何在呢?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风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移风易俗,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生活习俗,在理论上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也确实得到了逐渐的改变。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下子“齐步走”“向后转”就难以实现。比如,抽香烟的危害,那是人人皆知的。每包香烟的烟盒上,都按规定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但是,谁能下令全国烟民立即戒烟呢?一旦做出这个脱离实际的决定,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自明。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9页。

②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③ 宋德华:《〈戊戌奏稿〉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④ 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仍以“易服”为例，当时戊戌变法已进入攻坚阶段，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已呈白热化状态，改革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维新派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变法大业更离不开强大的社会舆论基础做后盾。康有为贸然抛出“易服”主张，让人们马上脱掉穿了二百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革履。且不说从审美角度上看，当时的人们是否能够接受，就是从更换服装的费用上来说，很多家庭也是一时难以负担的。所以，“易服”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维新派的威望因而降低，支持变法的社会力量因而涣散。用“纸说”方法分析，康有为的“易服”主张似乎是引领了时代之潮流，“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而回到戊戌变法现场，进一步考察“易服”主张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就会得出康有为此举是喧宾夺主、有悖民意、自乱阵线的败招的结论——这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论断。由此可知，“纸说”不过是飘浮在空中的枯树叶，而“实说”才是扎根于历史土壤的常青树。

并非多余的话

这些年来，“历史热”从未有降温的迹象，历史著述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研究、写作、讲座历史知识的人与日俱增，许多禁区被突破，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定论被推翻，许多错案被纠正……可以说是百家登台，众声喧哗，鱼龙混杂。我也不能免俗，因研究中国改革家的楷模孙家鼐，而意外地闯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阅读了各位前辈的研究成果，研究了许多史料，接触到一些当代戊戌变法专家、学者，眼界洞开，受益匪浅。窃以为，本书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所做的创新之论，也是对以前历史研究方法、理论及其成果的深刻反思——因为我看到了相当多“成果”，不是戏说、自说，就是纸说。我们怎么可以给虔诚的、嗷嗷待哺、也是上帝的读者提供掺有大量“三聚氰胺”的文史“乳品”呢？作为专家、学者，我们是否应该具有学术良知？这种欺世盗名的“成果”与市场上不法奸商兜售的假冒伪劣食品，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或许,有人会质疑:世上真有这样的专家、学者,举个例子看看啊?

远有康有为,近有郭沫若,当下的阎崇年,都可以算是典型代表。

康有为头上有很多光环,比如戊戌变法领袖、国学(儒学)大师、教育大师、书坛巨擘……康有为著述甚丰,其言论曾经作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基本依据而广受重视。其实,回到戊戌变法现场,就会发现,这个并未到任的七品工部主事,在红顶如云、等级森严的晚清京师,并非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要说其无法操纵国家决策,就是他的变法宣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其得意弟子梁启超早在康老师还健在时,就坦率地批评道:“(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①20世纪60年以来,经过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的考证、揭露,人们才恍然大悟,“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入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引入了歧途。”^②《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其描述带有康梁固有的党派色彩和偏见。“康有为确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把康有为的活动等同于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为惟一进步的力量,并仅从康有为的角度来描述整个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② 戴逸:《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序》。《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维新运动，并不正确。”^①

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家，其历史著述的权威性，在一定阶段曾经无人能比。但是，晚年的郭沫若却“脱胎换骨”，与先前那个追求真理、主张正义、敢怒敢言、文采飞扬的郭沫若判若两人，不仅诗文极尽奴言卑膝之能事，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是主动献媚，刻意逢迎，《李白与杜甫》一直为学界所诟病。1969年1月，他在给友人周国平的一封信中，不无愧疚地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阎崇年曾坐过十年冷板凳，是著名的清史专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中，他竟不顾历史事实和民族血泪，大放厥词：“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作为专家学者，他却不能设身处地地回到历史现场：当年满清占领者自食“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的郑重承诺，颁布“剃发令”，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在滴血的刀剑威逼之下，汉文化圈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发式被强行改变，以至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使数以百万计维护民族尊严、不愿剃发留辫的汉族百姓惨遭杀害。“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做出过有益的探索。可是，阎老先生却在“百家讲坛”上公然赞美惨无人道、禁锢思想、灭绝中华民族整体创造活力的“文字狱”，的确让人心寒。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近代史的研究比较强调事件的起因、人物的动机，好以起因定性质、以动机判善恶，而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效果重视不够，对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褒扬也往往只是归结到精神的层面，夸赞其‘斗争精神’如何如何。这实际是一种纯道德的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脸谱化了，同时它也夸大了道德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

^① 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的研究》，2001年第六期，第117页。

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社会效果,尤其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以此来评判历史,显然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①这种伪学术研究模式,如今已不该提倡。回到历史现场,以“生产力标准”作为研究指针,重估历史,刻不容缓!

真正的专家、学者,就应该回归学术,追求真理,不应该媚俗、低俗、哗众取宠,更不应该昧着良心,有意给读者提供含有“三聚氰胺”的文史成果!

^① 赵春晨:《坚持实践第一,重在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

目 录

序 我的“实说”历史主张	1
--------------------	---

变 法 新 说

第一章 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	3
“戊戌政变”的由来	3
亲政本是一句空话	5
“总裁”与“CEO”	9
子虚乌有的“政变”	12
第二章 戊戌变法是失败还是夭折	19
时代最强音：以教育扭转乾坤	21
洋务学堂的路子也走不通	26
宏伟蓝图再次被束之高阁	28
新政第一大举动	30
戊戌变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3
第三章 翁同龢何曾“冒寒留南海”	37
百年谎言相继被戳穿	37
两个乖戾之人	42
疑似作伪一新证	46
翁康交情有多深	49



第四章 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	54
伊、李北京“巧遇”	55
帝后矛盾骤然尖锐	57
慈禧回宫并无异常	59
一颗耀眼的变法之星	61
收权事件突然发生	62
袁昶“一载三迁恩遇无”	66
收回事权“非一日之寒”	67
第五章 戊戌变法夭折的必然性	70
“三大错位”的客观存在	70
“三大错位”的要害何在	74
康有为的错误早有定论	80
第六章 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83
正方、反方针锋相对	84
“康有为领袖说”的造神路径	86
康有为黯然跌下“神坛”	94
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	100
第七章 戊戌变法研究应走出误区	112
观念之误：帝党=维新派，后党=守旧派	113
重点之误：戊戌变法研究以康梁为中心	116
学科之误：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思潮混为一谈	122
定性之误：变法、维新、改良不是革命	124

人物新论

一、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133
（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134

(二) 对于变法,作出了理性思考和具体贡献	136
(三) 创立新的教育体系,促进中国教育转型	137
(四) 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	139
(五) 眼界高远,开“兼容并包”教育思想之先河	141
(六) 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	142
(七) 身先士卒,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之一	143
 二、创办京师大学堂立头功	146
孕育之功:新式学堂早筹划	146
开山之功:受命于危难之际	148
救护之功:巧借外力之力	149
 三、绝非政敌 堪称传奇	152
罕见的“五同”	153
深厚的交情	167
内在的原因	175
 四、和煦家风催人奋进	180
 五、寿州孙文正年谱	186

变法

新说

第一章

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作“百日维新”。

“戊戌政变”的由来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①

^① 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同年12月10日,日本《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主笔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并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分为五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书,集中说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①,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②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

① “百日维新”这一概念由梁启超提出。最早见于《清议报》中的《戊戌变记事本末》一文,专指1898年6月11日至同年9月21日的新政。

② 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六期,第82—83页。